



跨文化视角下的 对韩国直接投资

——进入模式与绩效研究

李大雷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本书受 2016 年度齐鲁工
和 2016 年度山东省软科学研

目 (项目编号: SKXMY1601)
16RKB01004) 资助

跨文化视角下的对韩国直接投资

——进入模式与绩效研究

李大雷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跨文化视角下的对韩国直接投资：进入模式与绩效研究 / 李大雷著. --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7.7

ISBN 978-7-5043-7947-4

I. ①跨… II. ①李… III. ①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国②对外经济关系—研究—韩国 IV. ①F831.6
②F125.53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63753 号

跨文化视角下的对韩国直接投资——进入模式与绩效研究

李大雷 著

策 划：庞 强 刘 媛

责任编辑：许珊珊

封面设计：宋晓璐·贝壳悦读

出版发行：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100045

网 址：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crtip8@sina.com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领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300 (千) 字

印 张：16.25

版 次：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43-7947-4

定 价：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李大雷，男，1982年生，齐鲁工业大学教师。2004年赴韩国求学，2011年毕业于韩国檀国大学研究生院贸易经营学（International Trade Management）专业，获经营学博士（DBA: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学位。韩国国际公正贸易学会（ISFT: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Fair Trade）会员。2012年回国至今任教于齐鲁工业大学。主要研究领域为 FDI 与跨国公司、东北亚经济、韩国学。近年来先后主持及参与省部级与厅局级各类课题 7 项，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10 余篇，出版译著 3 部，主编及参编教材 3 部。

序 言

当前,在经济全球化与资本国际化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作为在异质文化主体之间进行的经济交往活动,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利用国际资源享受全球化利益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一个国家促进其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合理化路径选择。鼓励和支持本国企业走出国门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并通过其开拓国际市场、寻求企业更为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已成为各个国家经济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近40年来,伴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战略的不断深化,在国家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政策引导和推动下,中国企业顺应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积极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和规模不断加快,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历程。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的步伐明显加快,越来越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对外直接投资一直保持着持续、快速和稳定的发展态势,具体表现在投资规模的持续增加,投资行业和投资区域的不断扩大,投资方式和投资主体的日趋多元化等诸多方面。特别是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世界经济复苏艰难曲折、下行压力较大、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持续下降的严峻形势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却逆市上扬,依然保持着连续稳步增长的态势。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公布的《2015年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5)数据显示,2015年,在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十五大经济体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三年位居第三位,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位居全球第八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这种良好的发展势头受到了一直以来作为中

国外资来源地的美国、欧洲、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地区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青睐，各国纷纷表现出吸引中国企业前来投资的高度热情，其中，与中国地理位置临近、经济互补性较强、双边贸易交流密切、产业合作发展空间巨大的韩国，近年来不断加大吸引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力度。

中韩两国隔海相望，地理位置接近且文化背景相似，两国之间的交流自古以来源远流长。在近代，由于诸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两国的关系虽然出现过短暂的起伏与停滞，但自1992年8月两国结束了长期相互隔绝与互不承认的状态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双边关系开始得到了全面的恢复和发展，中韩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其中，两国在贸易和直接投资等经济领域的合作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在贸易合作方面，2016年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及最大的进口来源国，韩国是继美国和日本之后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然而在直接投资方面，两国间的相互投资则存在着较大的不对称现象，具体表现为两国间的双向投资规模差距悬殊，韩国对中国的投资远远大于中国对韩国的投资。

经查阅相关资料发现，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始于1985年，至今只有三十年的发展历程，起步虽晚，但发展速度迅猛，截至2016年年底，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金额累计达686.9亿美元，中国已成为韩国的第二大投资对象国，韩国则是中国的第五大外资来源国；而与之相对的是，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的整体规模较小，从投资金额来看，同样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对韩国的直接投资总额累计101.6亿美元，两国之间的双向投资总量规模呈现出悬殊的差距。关于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进展缓慢的这种现状，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和中韩两国市场环境的差异两个角度进行考虑，而随着2015年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的正式签署和生效，两国双边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的进一步加强，中国商贸服务类小额赴韩投资持续增加，制造业领域到韩国获取技术型的投资也更为频繁；同时，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的动机也可以考虑转变为通过向韩国投资组织生产，灵活运用“Made in Korea”的原产地产品标记将产品返销中国，或利用韩国已与欧美等52个国家签署的FTA关税优惠政策等有利因素使所生产的产品绕过贸易壁垒进入美国和欧盟市场。由此可知，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的机会将会越来越多，投资的领域和形式也将变得更加多元化，据商务部统计

数据显示,2014—2016年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的金额连续三年显著持续增长,并已成为继美、日之后,韩国的第三大外资来源国。与此同时,关于两国之间相互直接投资的问题也日益受到产业界和学术界的共同关注,国内外学者们分别基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笔者在韩国攻读学位以及先后在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KOTRA)与韩国国际公正贸易学会(ISFT)工作期间,出于对中韩两国双边投资领域的兴趣和关注,平时借学习和工作之便收集了大量的关于韩国经济、贸易、投资环境以及中韩相互直接投资的第一手资料,并在韩国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数篇与之相关的研究论文,而那时中韩两国尚未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如今,正如前文所述,随着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生效,两国正式进入“FTA时代”,今后两国在直接投资领域间的交流预计将会更加活跃,尤其中国对韩国的直接投资将会呈现持续升温的趋势,但近期由于“萨德事件”导致的中韩两国关系的忽然降温以及由“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引起的韩国国内政治的波动等状况势必会在短期内对两国的相互投资带来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两国之间相互直接投资的相关问题出现了现有研究未能充分探究的新态势。在这种新的形势下,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中韩两国的相互直接投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特别是对于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的相关问题更应该进行广泛持续的关注和深入细致的研究,这促使笔者萌生了撰写本书的念头。同时,笔者在梳理现有的关于中韩两国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后发现,目前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成果已颇具规模、形式多样,但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则进展缓慢,成果较少,可以说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并且绝大多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征、投资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促进方案等理论层面的探索,而关于中国企业对韩国进行直接投资最初所面临的进入模式选择及企业最关心的投资绩效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再者,由于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同属于东亚文化圈,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较为相近的文化结构及文化特质,现有相关研究往往忽略了两国间存在的文化异质性对两国经济合作所带来的影响,因而在以往的有关中韩两国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中较少地涉及分析这种不可观测的跨文化因素的影响作用。

因此,在上述背景下,基于中韩两国经济交流的现状 & 未来展望,笔者

结合目前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关于中国企业对韩国的直接投资行为，特别是基于对中韩两国之间所存在的文化差异的考虑，从跨文化的视角对于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及其投资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探究和验证，以此撰写本书，从理论方面丰富、完善和发展前人有关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相关领域的现有研究，进而为后续研究提供有益的研究基础，并且在现实层面也通过本书为今后更多去韩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提供操作性较强的战略决策和合理的建议依据，同时，由点及面，期望本书的研究结果也能够为中国企业今后在世界范围内的跨国经营决策起到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也借鉴和参考了国内外许多学者的论著和文献，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和理论依据，在此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也要真诚地感谢在本书研究过程中接受过访谈的所有企业的工作人员和问卷填写者，以及帮助我联系调研企业的所有相关机构和朋友，在他们的帮助下，本书在数据收集和实证研究方面的工作才能够得以顺利地顺利完成。还有，衷心感谢我的硕士及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韩国檀国大学金诚恂教授，感谢他对我在韩国攻读学位期间，在生活和学习方面给予的热情帮助和细心教导。最后，我还要深深地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妹妹、其他关心我的家人以及我身边每一位朋友和同事，正是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怀、支持和帮助，才使得本书得以顺利完成。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自身学识和能力水平有限，书中难免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和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李大雷

2017年1月于济南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目的.....	2
第二节 研究的方法与结构.....	7
第二章 相关理论回顾与文献述评	10
第一节 跨文化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回顾	10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相关理论依据	38
第三节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相关理论依据	44
第四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47
第三章 对韩国直接投资概述	62
第一节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背景	62
第二节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发展历程	80
第三节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点	89
第四节 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分析.....	105
第四章 模型与假设.....	114
第一节 研究模型的构建.....	114
第二节 研究假设的提出.....	120
第五章 实证研究设计.....	136
第一节 变量的选取、界定与测量.....	136

第二节 样本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说明	145
第六章 实证研究结果	149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149
第二节 信度与效度分析	153
第三节 相关分析	161
第四节 假设检验与结果分析	164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185
第一节 研究的结论与启示	185
第二节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188
附录一 调查问卷	190
附录二 韩国《外国人投资促进法》新修改版	194
参考文献	234
后记	249

第一章 绪 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特别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欧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首的投资大国迅速崛起，国际资本的跨国流动日趋活跃，全球对外直接投资（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持续增长，投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了一个急速且稳定的发展时期，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舞台上日益活跃。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全球化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大大加快，世界各国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进一步扩大，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流向和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急遽的变化，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变化在不同的时期内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所公布的《2000 年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0）统计数据显示，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世界经济急剧增长的形势下，1990 年至 2000 年十年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以年均以高于全球 GDP 的增长速度 25% 的增速保持高速增长，2000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达到创纪录的 1.393 万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21%。而在 2001 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的破灭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下，全球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始进入短暂的停滞时期，2001 年与 2002 年全球对外投资金额为 8238 亿美元与 6512 亿美元，同比分别下降了 40.9% 与 21.0%。2005 年开始，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开始逐渐从低迷不振中摆脱出来，并进入了新一轮增长期，2007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入规模继续保持增长，对外直接投资金额突破 1.5 万亿美元，超过 2000 年所创下的历史纪录 1.393 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而 2009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额从 2008 年的 1.697 万亿美元

锐减到 1.043 万亿美元,同比下降 38.7%。近年来,世界经济正在走向缓慢复苏,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也随之逐渐恢复增长,2015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流量总额达到 1.763 万亿美元,总量回升 38%。另外,从投资国家主体方面来看,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以及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为了推动本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占据海外市场,纷纷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并取得了飞速的进展,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也逐渐由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扩展至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以及韩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目的

一、研究的背景

1. 现实背景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自 1978 年开始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后,中国逐步走向了世界。1979 年 8 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经济改革的十五项措施》,其中第 13 项措施明确提出了“允许出国办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在中国开始作为一项政策得到确定,并由此拉开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序幕。随之,从 1980 年起,中国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五矿集团、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为首开始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活动进行小规模试探性的尝试;进入 90 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鼓励和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①这使得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逐年增长。随后,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

^① 1992 年 7 月,国务院颁布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其中提出了企业可以在境外承揽工程、进行技术合作或者提供其他劳务,扩大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范围;1997 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有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鼓励扩大对外投资”;1999 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中指出“鼓励国有企业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确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发挥比较优势到国外设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等。

的 2002 年起,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步伐则变得明显加快, 投资规模与投资区域迅速扩大。2008 年, 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74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0 多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 投资金额达 559.1 亿美元; 虽然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给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市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然而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持续萎缩形成鲜明对比,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然逆势上扬并在总体趋势上呈稳步增长态势, 2011 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增至 746.5 亿美元, 存量达 4247.8 亿美元, 共设立境外企业 1.8 万家, 当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和存量分别居世界第 6 位和第 13 位。

目前, 在世界经济艰难复苏,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持续下降的严峻形势下, 2015 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规模高达 1456.7 亿美元, 连续三年位列全球第三, 并实现了自 2002 年以来的 14 年连续增长,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大部分国家的主要外资来源国。然而, 中国企业在蓬勃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同时, 也相应地存在着诸多问题。从全球范围来看, 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大部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 国际化水平不高, 缺乏海外经营经验, 技术水平与管理水平相对落后; 同时,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比例规模较小, 大多数投资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较为薄弱, 投资结构尚不完善, 且大部分投资领域集中在一些附加价值低的加工贸易领域, 分配不合理。尤其是在现阶段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的宏观环境和我国经济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的形势下, 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因此, 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 进一步提高中国对外开放的水平, 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健康良性发展, 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一领域极有必要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 从而为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丰富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2. 理论背景

跨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所面对的经营环境不再是单一的本土化经营环境, 而是由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主体所构建的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跨国经营环境。

当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跨国企业在向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时, 首先需要面对的是进入模式的选择问题。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受诸多因素的影响, 除去企业自身的因素之外, 投资经营环境对其的影响也十分重要, 如何综合考察这些影响因素, 选择恰当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

将会直接关系到跨国企业母公司对其子公司的资源配置水平和控制监管程度，同时也将会对该企业未来的投资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换言之，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企业跨国经营研究领域，有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理论界关注的研究热点，许多西方学者如 Anderson & Gatignon (1986)、Hennart & Park (1993)、Madhok (1998)、Claver & Quer (2005) 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的动机和条件，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理论和模型，例如交易成本理论、谈判力量理论、折衷理论、组织能力理论和企业战略理论等。另外，对于如何提高跨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最为关心的投资绩效问题，西方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讨，并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研究成果，如 Pan & Chi (1999)、Bróuthers (2002)、Child, Chung and Davies (2003)、Delios & Beamish (2004) 等已证明其影响因素主要有国际化经验、母公司的多元化经营程度、东道国体制环境、文化差异等。

但是，上述相关研究绝大多数是围绕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为对象所展开的，而中国作为当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使得中国企业在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组织机构、管理方式与经营理念等方面也必然与发达国家的企业之间有着很大的不同之处。所以，我们上面所探讨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界以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为对象展开的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与绩效的研究模型和研究成果很难直接照搬为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

与国外同类研究相比，国内研究起步略晚，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内学术界关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选择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尹建桥和柳爱民 (2001)、贺慈浩和贺燕敏 (2002)、周长辉等 (2005)、陈浪南等 (2005)、陈波和荣飞琼 (2008) 等，但这些研究大部分停留在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与战略等方面的归纳总结，且大多集中于理论探讨，研究结果缺乏实证数据验证的支持；另外，国内学者如班博 (2008)、刘阳春和吴瑶 (2009)、林自强 (2010) 等也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并指出了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但此类研究同样所涉及的实证分析偏少，特别是就中国企业对

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与投资绩效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所开展的研究则更为缺乏，后续研究进展缓慢，这将不能满足指导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需要。

无疑，立足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的实际，在探讨现有的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与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投资绩效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索中国企业合理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目的

根据以上所述的研究背景及研究动机，笔者将通过本书来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选择、投资绩效及两者之间关系开展实证性的深入研究。同时，基于在序言部分中所提及的中韩两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关系现状及展望，本书将以中国企业对韩国的直接投资作为切入点，实证分析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投资绩效影响因素以及进入模式与投资绩效之间的关系，以期完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对韩国直接投资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同时以点带面，期待本书中笔者针对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的研究能对今后中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中韩两国同为亚洲国家，地理位置接近，经济互补性较强，自古以来，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进入当代，以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为契机，两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开启了新的篇章，同时，随着在2015年中韩自由贸易协定（FTA）的签署生效，中韩两国正式进入“FTA时代”，这必然将成为推动两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并将会带动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交流。

作为两国经济领域交流的一个重要层面，自建交以来，随着中韩两国经贸关系发展的日益密切，两国在双向直接投资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总体看来，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始于1985年，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至2016年，韩国对中国实际投资累计686.9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继美国之后韩国的第二大投资对象国，韩国是中国的第五大外资来源国。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对韩国的直接投资长期以来一直增长乏力，投资规模较

小,两国的双向投资规模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现象。但近四年来,尤其是自2012年5月中韩正式宣布启动FTA谈判以来,得益于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的战略以及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预期效果,中国对韩国的直接投资增幅十分显著,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统计数据显示,1992年中国向韩国的直接投资金额仅为100万美元,而到2014年则剧增至11.9亿美元,同期相比增长147%,年均投资增长率达37.6%,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对韩国实际投资累计10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韩国的第三大外资来源国。

随着新形势下中韩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以及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规模的逐步扩大,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的相关问题也吸引了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广泛关注。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的国内外相关研究始于2004年,2007年后开始逐渐增多,但整体上来看,此类研究进展缓慢,成果较少,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且绝大多数研究(如金和燮,2004;金泰植,2008;白权浩等,2009;崔义炫和张娜,2011;李大植,2016;尹胜炫,2008;许兴镐,2010;韩禧,2014等)主要集中在关于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的现状与特征、投资所存在的问题及改善方案等理论层面的研究。当然,除此之外,尹盛焕(2004)、尹胜焕(2007)以及李大雷和金诚恂(2011)等研究也曾尝试从实证层面来探讨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选择及投资绩效问题,但目前此类研究非常有限,且它们在研究深度及研究方法上仍存在较多不足,比如从分析方法上来看,这类研究在构建研究模型时,所选取的解释变量较为单一,并不能够从整体上反映出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时进入模式选择以及投资企业最关心的绩效的影响因素^①。

因此,本书中笔者所开展的研究将首先梳理对外直接投资基本理论及有关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策略和投资绩效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针对前人相关研究的不足之处,以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提

^① 如尹盛焕(2004)主要从投资企业的所有权优势考虑,仅将企业的营销能力、技术能力和财务能力纳入解释变量,分别检验了这三者对于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时对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另外,尹胜焕(2007)从子公司与母公司的依存度、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子公司的营销能力、投资风险性以及对母国资源供应的依赖性等五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对韩国进行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选择,并检验了不同的投资进入模式对投资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的影响,然而在解释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行为而构建研究模型选取解释变量时却忽略了东道国国家特征及社会文化差异等因素。

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理论研究模型,即综合考虑投资企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将前人研究中没有涉及的母国企业的人力资源优势、东道国的外资规制政策、东道国的市场需求以及文化异质性等因素纳入研究模型的解释变量中,实证检验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与投资绩效的关键影响因素以及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进而为在“中韩 FTA 时代”背景下那些对韩国直接投资跃跃欲试的中国企业在进军韩国时如何进行进入模式的选择决策以及如何有效地改善投资绩效提供合理的建议依据,并以此为基础为中国企业在中国范围内的直接投资与跨国经营决策提出经验借鉴。

第二节 研究的方法与结构

一、研究的方法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即笔者在经过前期对相关理论及现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科学的考察、整理与归纳,梳理与本研究内容相关的核心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多要素互动整合研究模型并提出研究假设,以此对于调查研究的对象进行数据收集和处理后,利用所获取的有效数据对模型和假设进行检验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研究结论。具体来讲,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笔者在深入考察跨文化和对外直接投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对现有的国内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选择和投资绩效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对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准确的归纳整理和科学的分析研究,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特征与趋势,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及障碍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在实证分析部分,基于对相关理论的探讨并立足于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针对前期相关研究成果的不足之处,笔者构建了一个整合的研究模型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合理选取相应的量化指标,之后利用对研究对象的调研所得出的数据,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在已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实证分析结果,为中国企业对韩国直接投资如何合理地选择进入模